

农业现代化研究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SN 1000-0275, CN 43-1132/S

《农业现代化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三变”改革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作者：杨慧莲，桂浩，郑淋议，郑风田
DOI：10.13872/j.1000-0275.2024.2069
收稿日期：2024-11-29
网络首发日期：2025-03-17
引用格式：杨慧莲，桂浩，郑淋议，郑风田.“三变”改革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OL]. 农业现代化研究.
<https://doi.org/10.13872/j.1000-0275.2024.2069>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农业现代化研究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引用格式：

杨慧莲, 桂浩, 郑淋议, 郑风田. “三变”改革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YANG H L, GUI H, ZHENG L Y, ZHENG F T.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 analysis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5,

DOI: 10.13872/j.1000-0275.2024.2069

CSTR: 32240.14.1000.0275.2024.2069



“三变”改革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机制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杨慧莲¹, 桂浩¹, 郑淋议², 郑风田^{3*}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2.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3.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其深化在促进农户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三变”改革-要素配置-农户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2005—2021年中国22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采用合成控制法(SCM)量化评估“三变”改革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与效应, 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1) 农村“三变”改革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 “三变”改革通过优化农户土地要素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配置, 并通过优化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要素配置, 进而提高农户收入; 3) “三变”改革通过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的配置, 促进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基于此, 未来应进一步规范改革实践过程, 细化关键节点的考核, 完善效果评估机制, 确保“三变”改革政策的有效落实。同时, 积极推进土地、资金、劳动力服务平台建设, 并持续优化改革的宏观环境, 创建有利于“三变”改革落地实施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三变”改革; 农户增收; 要素配置; 合成控制法;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 analysis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

YANG Huilian¹, GUI Hao¹, ZHENG Linyi², ZHENG Fengtian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3.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 The reform and deepening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and advanc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ree changes” reform-factor allocation-rural household income. Using panel data from 22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1,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 is employ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impact and effects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 model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re applied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and analyz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2) It enhance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b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betwee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s well as by 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factors among different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3) The reform promotes income growth by influencing rural labor allocation and increasing wage-based earning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standardizing reform practices, refining the assessment of key implementation stage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of reform outcomes to ensure policy effectiveness. Additionally, adva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ervice platforms for land, capital, and labor, optimizing the macro-level reform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supporting mechanisms are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Keywords : “three changes” reform;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resource allocati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common prosperity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4-11-29;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4-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59, 21ZDA055)。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1ZDA059, 21ZDA055).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zft2000@126.com)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农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进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然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强调在促进农民勤劳致富的同时,帮助其更多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从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挑战在于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建立起有利于农户持续增收的体制机制^[1]。现代产权理论强调,权责明晰、保护严格的产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包括改善存量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自由平等交易、节约交易成本等机制^[2]。因此,探索促进农户增收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践,并评估其效应,对于推动农户增收、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农村改革的基础上逐步深化的^[3-9]。2014 年 11 月,《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的审议通过,标志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随着中央各部门积极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出台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政策,全国各地积极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10]。其中,起源于贵州六盘水市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以下简称“三变”改革)自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年被列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11-12]。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批地市将“三变”改革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示范,学习其成功经验。特别是 2022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提出,在“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部分,要“深化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同时,学术界围绕改革实践与作用的研究也逐渐丰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总结与提炼改革的内涵、实践和价值。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营体制遭遇发展瓶颈,被视为“三变”改革的逻辑起点,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制度设计有助于唤醒沉睡资源、聚集分散资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是对习近平农村市场化理论的进一步印证^[13-19]。二是阐述改革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对策。例如,刘琴和周真刚^[20]指出,“三变”的股权化模式是一种新型农村股份合作方式,在实践中,“股权”架构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或固定模式,可能会出现入股资产评估随意、管理监督权限缺失、股份配比难以

兼顾管理层激励、股权转让与退出困难等问题,应采取多种措施提升风险防控能力^[21]。三是对改革作用与影响效应进行分析评估。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三变”改革在推动精准扶贫方面的创新模式与效果^[22-23],也有研究关注“三变”改革在促进农户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与效果^[24-26]。

已有研究广泛讨论了“三变”改革的机制设计及其影响,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27],但目前仍缺乏基于较长时期面板数据或微观调查的大样本数据,来评估改革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因此,本文在介绍改革制度背景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变”改革-要素配置-农户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 2005—2021 年中国 220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三变”改革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并进一步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三变”改革通过促进土地和资金要素优化配置,进而影响农户增收的内在机制;此外,运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在“三变”改革推动农户增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促进农户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1 农村“三变”改革背景与研究假说

1.1 制度背景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被誉为“三农”领域具有“基础性、全局性”作用的重大改革,是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28-29]。从政策层面来看,自十八大以来,《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中国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体系。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全国各地积极探索“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收益”的改革路径,努力实现从“两难”到“双赢”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12,30]。其中,农村“三变”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

根据对“三变”改革提出过程的系统调研,本文将“三变”改革的提出与扩散历程总结为四个阶段:1) 基层探索阶段。2012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发布。与此同时,贵州省内部分煤炭企业因转型压力转向农业产业投资。为解决农村各类资源要素“小、散、乱”的问题,六盘水市盘州市普古乡、娘娘山、水城区米箩镇、钟山区大河镇等地区率先探索通过多元经营主体以资源入股实现合作的

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进一步地,六盘水市相关部门在调查并总结基层创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民”的“三变”改革,并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2) 整市推进试点阶段。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汪洋副总理对六盘水通过“三变”改革助推脱贫的实践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同年作出批示:“把盆景变风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讲话时指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六盘水市在落实总书记指示后,将“三变”改革的内涵明确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并逐步在全市推进试点。3) 全省推开试点阶段。2016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推进会,针对改革的实施策略进行专题讨论,随后在贵州省21个县(市、区)率先开展改革试点。2017年,贵州省出台了《关于在全省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将“三变”改革从贵州省21个试点县(市、区)推广至88个县(市、区)。4) 国家试验及全国扩散阶段。2017年,六盘水市被原农业部批复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并主要承担“三变”改革的实验任务。此后,包括安徽、甘肃、陕西在内的多个省(区、市)纷纷学习借鉴六盘水的“三变”改革经验,改革内容也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中。

进一步分析表明,从时间演进的机理来看,中央政府组织、全国性组织、政策推动者等政治力量共同推动了“三变”改革的扩散^[31];从空间扩散趋势来看,“三变”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效应,但在一些地区则呈现跳跃性^[32];从内容扩散的特点来看,各级政府不仅仅是模仿学习,还在积极探索创新,并逐步丰富“三变”改革的实践内涵^[33]。

1.2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

1.2.1 理论机理 过去40年,中国农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主要围绕产权进行,形成了从“两权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置”的制度变迁耦合阶段特征^[34]。这种制度设计的演变旨在通过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排他权,稳定预期,进而激励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然而,产权强化的政策效果似乎并未

完全达到预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除了要完善农地产权界定的制度安排外,还需要探索产权实施层面的经营方式转型,其中交易制度的创新和组织选择尤为关键^[35]。

农村“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将资源转化为资产、资金转化为股金、农户转变为股东,从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根据当前各界共识:“资源变资产”指的是村集体和农户通过评估并折价确认耕地、林地、草地、山地、房屋及基础设施等集体或个人资源,并通过协议或合同形式入股投资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涉农企业等),形成代表股份权利的资产;“资金变股金”指将各级财政投入的村庄发展类资金、招商引资资金、村集体积累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等,通过协议或合同方式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于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并根据股份份额分享发展收益;“农户变股东”指农户以其承包土地经营权、宅基地、自有房屋、自有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入股投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股东,并根据股份分红享受发展收益^[36]。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三变”改革不仅涉及产权界定,还涵盖了产权实施方面的多项措施。改革并非单一措施,而是一系列综合性的改革措施,其内容包括“确权、赋权、易权、活权”四个层次^[37-38]。

确权是“三变”改革的基础,主要通过清产核资和成员身份认定等手段,对农村资源资产进行全面确权。通过明确“变什么”,农户和村集体对耕地、林地等自然资源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以及各类政府资金投入的权属进行明确界定,从而增强资源的排他性^[39]。赋权是改革的关键,旨在通过股份形式显化资源价值。长期以来,农户与村集体在资源利用过程中面临“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问题,缺乏有效的资源要素价值实现途径。通过量化股份、折股“赋权”,能够赋予资源所有者索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减少行为障碍。易权和活权则是“三变”改革的核心,进一步明确了“谁来变”这一产权实施方面的关键问题。通过多措并举,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服务主体参与,增强乡村产业的营运能力^[40]。

1.2.2 研究假说 作为产权实施的交易载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服务主体通过整合和重构分散的乡村资源,将其投入到区域优势产业经营,进而通过创新经营模式、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满足市场需求,提升资源要素的价值。此外,改革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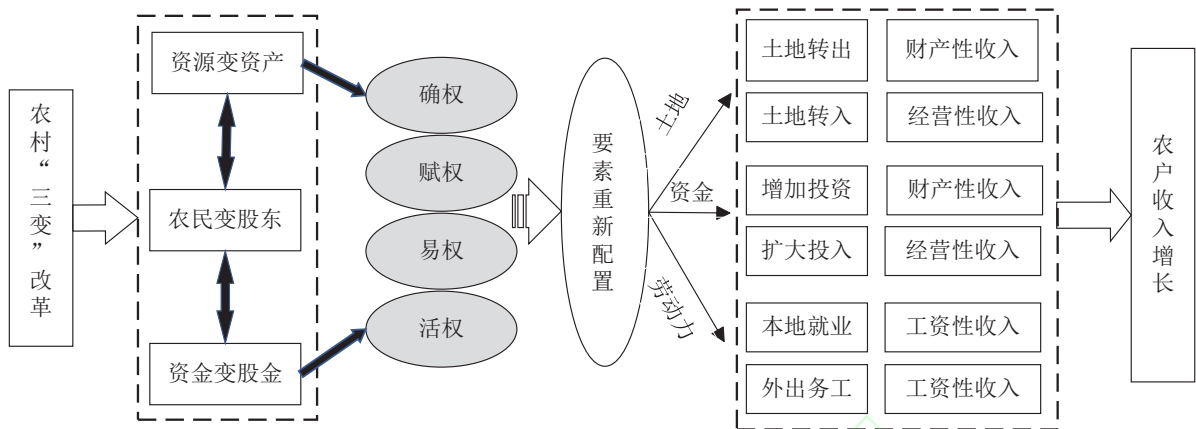


图 1 “三变”改革农户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框架

Fig. 1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its mechanism framework

明确回答了“为谁变”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服务主体在清晰界定资源权属和股份权能的基础上，利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等制度设计，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资源整合投入区域优势产业，并根据股份比例分配发展收益。通过这样的设计，既能减少租值耗散，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又能通过嵌入服务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农户通过股东身份分享发展收益，进而提升其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三变”改革对增加农户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进一步探讨“三变”改革促进农户收入的内在机制。由上述分析可知，改革通过重新配置农村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来推动农户增收。具体来看，土地要素的重新配置对普通农户而言，能够在获得固定股金的基础上，按照要素折股股份分享产业发展收益。相比传统的土地流转方式，股金+股东的制度设计更能满足土地要素参与发展的条件，激励土地所有者通过入股方式转出土地，有助于增加财产性收入^[30, 41]。对于规模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三变”改革有利于促进土地“三权分置”的落实，帮助转变农民对土地的社会属性依赖，使懂技术和善经营的主体能够参与农业规模经营，增加经营性收入^[42]。同时，“资金变股金”制度有助于激励资金所有者将资金转化为股金进行投资，促进经营者财产性收入增长。土地、资金的重新配置也带动了劳动力要素的调整。农户在制度激励下，愿意将土地要素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劳动力资源有机会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寻找与劳动能力匹配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性收入。同时，农业产业的壮大吸纳了部分劳动力本地就业，进而

提高了工资性收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土地、资金、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在“三变”改革促进农户增收中具有中介作用，主要通过增加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形式，促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提升农户整体收入。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数据说明

为确保政策评估的准确性，本研究遵循 Abadie 等^[43]的建议，即使用合成控制法时需要有充分的政策干预前后数据。研究数据选取了 2005 年至 2021 年间的中国地级市层面连续 17 年的面板数据，以便准确拟合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经济特征及结果变量。初始样本的确定依据为 2005 年《全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鉴于六盘水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故排除了国家统计局界定的 35 个大中城市。此外，考虑到行政区划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剔除了 2005 年后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巢湖市和莱芜区，以及因数据严重缺失无法纳入分析的拉萨市。根据新闻报道和官方通报，本研究还剔除了 2017 年及之前已实施农村“三变”改革的其他 29 个地区，最终选定 220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广泛，主要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口密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变量数据，本文对所有变量数据均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一产业增加值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对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本文从各省及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补充相关数据，并利用 EPS 全球统计数据平台整理数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则来源于各省及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极少数未在省市级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报告的数据，尤其是缺失的 2020 年人口密度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估算。

2.2 模型设定

2.2.1 合成控制法 为检验农村“三变”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参考 Abadie 等^[43]的模型，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SCM）量化评估“三变”改革政策对六盘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为对照组中的每个城市分配权重来创建一个虚拟六盘水市，使其在政策实施前的表现与真实六盘水市尽可能相似。这样虚拟六盘水市的结果可以模拟六盘水市未受政策干预的情况，从而估计出政策效应。该方法拓展了传统双重差分估计方法（DID），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双重差分估计的主观选择偏误，且有助于解决模型中潜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关于合成控制法的基本原理及其操作流程参阅并借鉴已有文献^[43-44]。

本文以贵州省六盘水市自 2017 年被原农业部批复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并主要承担农村“三变”改革实验任务为政策干预开始期，六盘水市为处理组，全国其他 219 个未实施改革的地级市为对照组。设定模型如下：

$$e_{it} = Y_{1it} - Y_{0it} \quad (1)$$

式中： Y_{1it} 为城市 i 在 t 时期接受政策干预时的潜在结果， Y_{0it} 为城市 i 在 t 时期未受政策干预时的潜在结果，对于对照组而言 $Y_{1it} = Y_{0it}$ ，对于处理组本文用 e_{it} 来表示“三变”改革的政策效应。

2.2.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为检验“三变”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具体过程中，选取上文 SCM 模型中的预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是否完成“三变”改革这一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逻辑回归，从而得出倾向得分值。基于匹配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该政策效应进行估计，对应模型如下：

$$Y_{it} = \beta_0 + \beta_1 A_{it} + \beta_2 P_{it} + \beta_3 (A_{it} \times P_{it}) + \gamma X_{it} + \delta_i + \eta_t + \xi_{it} \quad (2)$$

式中： Y_{it} 表示个体 i 在 t 时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 A_{it} 为一虚拟变量，六盘水市取值为 1，

其他城市为 0。 P_{it} 为改革实施时间虚拟变量，2017 年及之后为 1，之前为 0。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δ_i 为城市固定效应； η_t 是年份固定效应； ξ_{it} 为误差项； β_0 为截距项； β_1 和 β_2 分别表示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固有差异及时间趋势效应； β_3 即双重差分估计量，代表“三变”改革对处理组六盘水市的净政策效应。

2.2.3 中介效应模型 为揭示“三变”政策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借鉴已有研究在因果推断中关于中介效应分析的建议^[45]，此处选择的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明确因果关联，故主要关注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首先需验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Y_{it} = \beta_0 + \beta_1 R_{it} + \gamma X_{it} + \delta_i + \eta_t + \xi_{it} \quad (3)$$

式中： Y_{it} 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 β_1 表示“三变”改革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直接效应； R 为虚拟变量，表示地市是否完成“三变”改革，在 2017 年及之后完成“三变”改革的样本取值为 1，否则为 0。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3）用于中介效应检验。

$$M_{it} = \alpha_0 + \alpha_1 R_{it} + \gamma X_{it} + \delta_i + \eta_t + \xi_{it} \quad (4)$$

式中： M 被定义为中介变量； α_0 为截距项； α_1 反映出“三变”改革对中介变量 M 的影响，用于计算间接效应。其余变量与式（2）相同。

2.3 变量选择

2.3.1 结果变量 为满足统计模型的假设并提高数据的正态性和稳定性，本文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作为结果变量，以揭示“三变”改革政策干预对农民经济福祉的深远影响。

2.3.2 中介变量 结合前文理论机理分析，农村“三变”改革通过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提升农户总收入。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中，相应地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因此，本文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作为中介变量，并对其进行对数变换，以分析政策影响的机制。

2.3.3 预测变量 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预测变量：农业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具体解释如下：农业发展水平：该变量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来衡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带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从而为农户带来更高的收入增长^[46]；人口密度：作为反映地区劳

动力资源丰富程度的关键指标, 人口密度对地区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47];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款: 该变量通过计算全市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减去市辖区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来定义。由于我国县域城镇化率较低, 且居民储蓄率较高, 县域金融机构存款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农民的总体收

入变化情况;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 这两个变量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 促进农民创业, 并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而提升农户收入^[48-49]。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差
结果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收支结余	1.058	0.638
中介变量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 / 亿元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放贷总额	562.592	936.433
	第一产业增加值 / 亿元	地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58.675	118.591
预测变量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款 / 亿元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吸储总额	860.170	1 173.836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万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105	3.106
	人口密度 / (人 / km ²)	年末户籍人口 / 行政区域总面积	405.335	313.528
	农业发展水平 /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14.252	8.489
	财政收入 / 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9.978	152.714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 2005 年至 2021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口密度、全市县域住户存款等预测变量数据来合成六盘水市的虚拟对照组, 运用 Stata 的 Synth2 命令测算出合成六盘水结果变量指标的最优权重组合。如表 2 所示, 吕梁和丽江所占合成权重较大, 昭通和汕头的合成权重较小, 其他城市所占权重均为 0。

表 2 合成六盘水市的城市权重组合

Table 2 Combinations of urban weights for the synthesis of Liupanshui city

城市	吕梁市	丽江市	昭通市	汕头市
权重	0.487	0.323	0.146	0.043

图 1 展示了在“三变”改革完成前后实际与合成六盘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的对比情况与政策效果。结果显示, 六盘水全市改革完成后, 其与合成六盘水市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上的差距呈显著上升趋势。而在改革完成前, 实际数据与合成模型预测的曲线在整体上趋于一致, 模型拟合度较高, 表明上述地区的加权平均可以较好地模拟出六盘水全市改革前的状况, 从而为估计“三变”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

进一步分析改革前后的数据差异, 六盘水市的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17 年后迅速上升, 显示出改革带来的显著效果 (图 2)。尤其是自 2017 年起, 实际值与合成六盘水的对比差距开始显著扩大, 且逐年提升, 证明了“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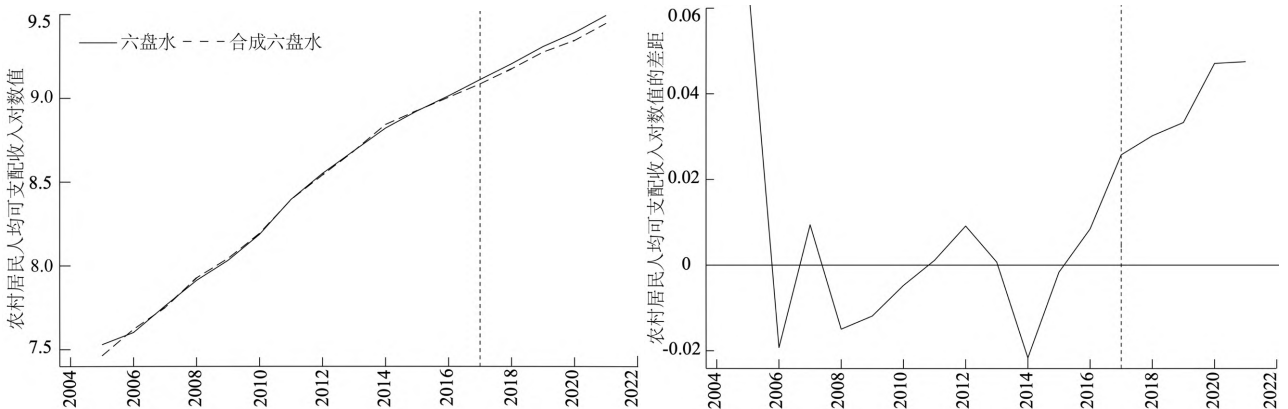


图 2 六盘水与合成六盘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logarithmic values of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between Liupanshui and the synthesized Liupanshui

续影响。具体来看，2017 年实际与合成值的差距为 0.026，2019 年增至 0.033，到 2021 年其差距达到 0.046，这表明农村“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仅是短期的，而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合成值在某些年份中较为平缓，主要是由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数量不对称性所造成的。具体而言，处理组只有六盘水市这一单一单位，而对照组则由 219 个城市构成。这种数量的不对称性可能在视觉上掩盖了实际的政策效应。然而，从统计结果来看，政策处理效应依然是显著的。后续进行的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表明“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增收效应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六盘水市盘州市自 2013 年开始实施“三变”改革，逐渐为其他县（市、区）所模仿。至 2017 年，六盘水市全面实施改革，通过出台各类相关政策强化改革部署，重视培育并嵌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推动区域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多措并举提高农户收入。这一时期，实际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大，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差距持续扩展，表明政策实施后，农户收入的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除了直观反映农户收入的提升之外，这一差距的扩大还体现出“三变”改革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土地资源配置优化和金融资源更好地流向农村等深层次影响。例如，盘州市舍烹村通过“三变”改革的制度设计，实现资源重组与组织重构，推动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从一个深山中的贫困“空壳村”一跃成为美丽乡村的明星村落，其发展实践为本文研究结论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3.2 安慰剂检验

依据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六盘水市在 2017 年全域基本完成“三变”改革之后，其与合成六盘

水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样本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六盘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在 2017 年及之后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然而，这种差异是否确实由改革实施所引起，仍需进一步探讨。此外，是否存在其他未观测到的外部因素影响研究结果，也是本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排除偶然性以及其它未观测到的外部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将采用合成控制法中的处理组变换检验方法，对已得出的估计结果进行验证。该方法将选取其他未实施“三变”改革的地区作为对照组，比较其与合成控制模型的预测结果，以评估改革效果的特异性。具体来说，检验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检验来确定所观察到的收入增长现象是否与“三变”改革政策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关联，从而排除其他随机性因素或未观测到的变量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若合成控制法的估计结果揭示出显著的伪政策效应，则表明原先的结论可能缺乏稳健性，暗示观察到的政策效应并非政策干预的直接结果，而是由其他未考虑到的因素所引起。

在本研究中，首先剔除六盘水地区数据。参考 Abadie 等^[50]的做法，选择未实施改革且合成权重较大的对照组地区^[51]。然后，采用合成控制法分别对这些城市进行拟合，确定实际地区与合成地区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上的差异。最后，考察这一结果是否与之前的分析保持一致，若结果一致，则先前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稳健性；反之，则说明之前结论有效。图 3 展示了合成六盘水权重较大的吕梁和丽江两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的检验结果。通过检验，发现这两个城市在 2017 年之前实际与合成的差异较小，拟合效果优良，这表明合成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变化趋势。2017 年之后，情况略有不同。吕梁的拟合值略高于实际值，而丽江的实际收入与合成值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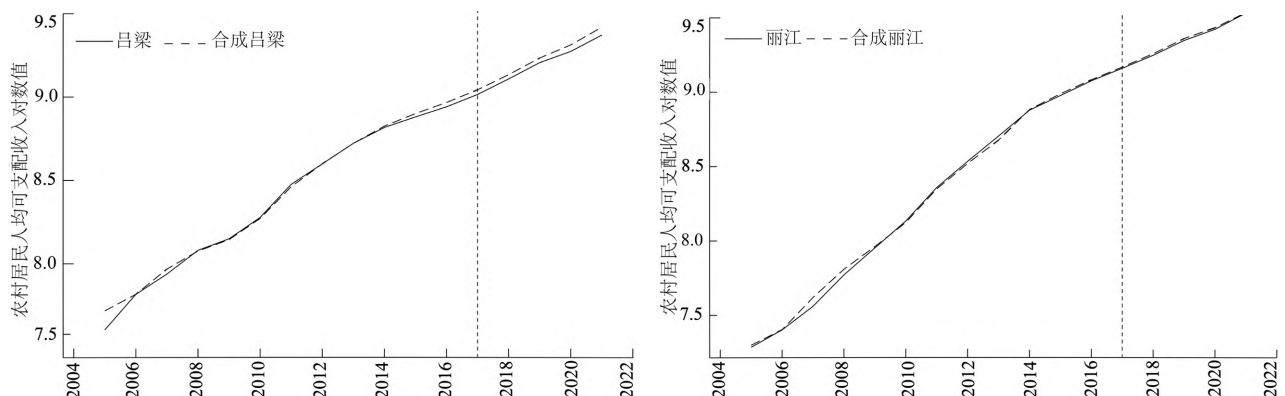


图 3 处理组变换检验

Fig. 3 Transformation tes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一致。这一结果表明, 尽管这两个城市的合成权重较大, 但其收入增长与合成值存在差异, 且这种差异并没有表现出改革带来的显著效应。

总体而言, 合成权重较高的吕梁和丽江两市的实际收入均低于合成值, 这进一步支持了“三变”改革政策的有效性, 表明假设的政策实施并未促进这些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显著提高, 因此, 检验结果显示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 PSM-DID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验证“三变”改革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否稳健。通过估算模型中交互项的参数 β_3 , 如果其显著为正, 则表明改革政策对收入有正向影响。表 3 展示了 PSM-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 交互项的检验结果为 0.290, 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 表明“三变”改革政策的执行对六盘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 在“三变”改革实施前, 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上差距为 -0.673, 而在改革实施后, 处理组的收入增长为 -0.383, 对比处理前, 收入差距缩小并呈现正向变化。双重差分的估计值为 0.290, 且 T 值为 6.30, P 值为 < 0.001 , 说明这一结果在统计上显著, 支持了“三变”改革对于农户收入提升的积极影响。综上所述, PSM-DID 方法所得的检验结果有效地支持了先前的研究结论, 验证了“三变”改革政策在六盘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中的显著作用。此结果表明, 改革的实施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实际操作中也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表 3 “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影响的 PSM-DID 估计结果
Table 3 PSM-DID estimation results on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三变”改革实施前			“三变”改革实施后			双重差分 检验结果
	对照组	处理组	差分	对照组	处理组	差分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8.875	8.202	-0.673	9.686	9.304	-0.383	0.290
标准差			0.026			0.038	0.046
T 值			-26.17			10.05	6.30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样本数	747	11	758	914	5	919	1 677
R ²							0.60

注: ***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3.4 机制检验

3.4.1 土地要素重新配置与农户收入 根据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分析, 农村“三变”改革政策主要通过推动土地、资金、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来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农业生产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 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提升直接反映在农户收入的增加上。因此, 在分析“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潜在影响机制时, 本文首先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中介变量, 研究土地要素重新配置的影响。

表 4 中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经过控制详细的控制变量集并同时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后, 解释变量“三变”改革的估计系数为 0.094, 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三变”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 与本文的理论预期和实证分析结果一致。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三变”改革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对数的回归系数为 0.573, 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明该政策变革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三变”改革通过推动土地要素的重新配置,

尤其是通过流转和入股等方式将农民手中的闲置土地转化为资产, 从而拓宽收入渠道。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不仅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 还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 进而显著提高了第一产业的增加值。

表 4 土地要素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land factor mechanism

变量	基准回归	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系数	系数
“三变”改革	0.094*** (0.017)	0.573*** (0.04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740	3 740
调整后的 R ²	0.989	0.98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3.4.2 资金要素重新配置与农户收入 为更全面地评估“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 本文进一步选取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作为第二个中介变量, 评估“三变”改革对农村地区信贷需求与政府

金融支持的影响，即分析“三变”改革的资金要素配置效应。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支持的增强不仅能直接推动农户收入增长，还能为当地农村特色产业及乡村企业的成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间接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提升。因此，选取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作为中介变量，可较为合理地衡量出“三变”改革引致的资金要素重新配置对农户增收的影响。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三变”改革对第二个中介变量（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的对数）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即“三变”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该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金额。由此可以推测，在实施“三变”改革的地区，资金要素的优化配置是县域金融机构贷款显著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具体而言，“三变”改革通过将农民的土地转化为股金，不仅增加了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需求，还提升了贷款可获得性。此外，改革通过明确产权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优化了农村信用环境，降低了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增强了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服务能力，并提高了各类经营主体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这一资金支持有助于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进而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促进农户收入的提升。

表5 资金要素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capital factor mechanism

变量	基准回归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的对数
“三变”改革	0.0941*** (0.017)	0.2471*** (0.07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740	3 740
调整后的 R ²	0.989	0.950

3.4.3 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与农户收入 受制于统计数据可得性，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等相关变量数据

缺失严重。为确保数据的代表性，课题组2022年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六盘水市水城区作为样本地区。对水城区下辖21个乡镇（不含街道办）进行经济发展水平和“三变”改革产业面积双重指标排序，再从中随机抽取9个乡镇，24个村庄展开调查，最终收集到511份农户问卷^[36]。

通过对微观调查数据样本特征与家庭特征分析，发现未参与改革样本与参与改革样本在户主年龄、教育程度、风险态度、家庭总人口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否有亲朋在政府部门工作等方面差异较小。相对而言，两类样本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方面有所不同，参与改革的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更大，这可能意味着农户更倾向于以“农民变股东”的方式参与改革。进一步分析表明，参与改革的农户家庭与未参与改革的农户家庭在收入差异上存在显著差距，尤其在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方面，差异更为明显。表6的数据显示，2013年到2021年间，未参与改革和参与改革的农户家庭在各类收入上均有所增长，且参与改革的农户在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增速更快，从而导致与未参与改革的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具体来说，参与改革的农户在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方面比未参与改革的农户多增加了1 780.42元，在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方面增加了666.07元。

这些微观调查结果与理论机理分析一致，即农村“三变”改革通过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如“保底租金+收益分红”机制），不仅帮助农户提高了财产性收入，还激励他们将土地资源入股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这样，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日常的土地经营中解放出来，转向务工并获得相应的工资性收入，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例如，课题组访谈显示，在猕猴桃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户通过“土地租金+收益分红”模式流转土地，同时

表6 2013和2021年未参与改革和参与改革农户收入情况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farmers' income between non-participants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reform in 2013 and 2021

样本	家庭人均总收入/万元	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万元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万元	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万元	家庭人均转移支付收入/万元	
未参与改革样本	2013年	1.287 (5.773)	0.582(5.776)	0.682 (0.775)	0.005 (0.029)	0.018 (0.050)
	2021年	2.040 (3.073)	0.780(3.037)	1.183 (1.152)	0.025 (0.144)	0.052 (0.133)
	2021和2013年差值	0.753	0.198	0.501	0.020	0.034
参与改革样本	2013年	1.025 (1.001)	0.138 (0.280)	0.826 (0.948)	0.029 (0.069)	0.032 (0.010)
	2021年	2.083 (2.210)	0.389 (1.578)	1.504 (1.363)	0.116 (0.249)	0.074 (0.358)
	2021和2013年差值	1.058	0.251	0.678	0.087	0.042
改革与未改革样本的综合差值	0.305	0.053	0.177	0.067	0.008	

注：家庭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均是以对应收入直接除以家庭总人口数计算获得。未参与改革样本样本量为181，参与改革样本样本量为330。

依托园区就业获取稳定务工收入, 每月增收 2 000~3 000 元^[36]。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 “三变”改革经历了基层探索、整市推进、整省试点、全国扩散四个阶段, 推动力量包括中央政府、全国性组织等。从空间扩散来看, 一些地区表现出集聚效应, 而其他地区则呈现跳跃性扩散。各级政府不仅模仿学习, 还进行了实践创新。

2) “三变”改革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和“农民变股东”三项制度设计, 优化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配置。特别是通过区域优势产业的带动, 整合分散资源, 明确农户的股份权能, 增强农户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3) “三变”改革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 特别是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力向更高收入领域的转移, 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积极推进“三变”改革以促进农户增收。一方面, 应根据各地区农村资源禀赋条件, 规划并培育具有区位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探索“三变”改革实践的创新路径与可行模式; 另一方面, 要规范改革实践过程, 细化关键节点的考核, 并完善改革效果评估, 以确保“三变”改革政策的有效实施。具体而言, 首先, 应细化清产核资工作, 明确资源资产的权属; 同时, 应清晰界定成员身份认定方式, 以避免赋权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与纠纷; 其次, 推动产权交易平台(或中心)的建设, 并规范资产评估程序, 为资源权利转移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 要强化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 提升其经营服务能力, 从而保障资源活权的顺利实施。其次, 应制定针对改革关键环节的考核方案, 定期对“三变”改革项目进行评估, 防止改革偏离初衷或出现变样。

2) 优化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 促进农民增收。首先, 优化土地流转平台建设, 通过完善土地流转流程、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强化土地流转的法律保护等举措, 搭建区域土地流转公共平台, 为土地流转创造有利条件。其次, 提升地区公共服务能力。一方面, 要为外部资本要素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全流程服务, 及时解决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并保护外部投资主体的权

益; 另一方面, 要规范各类产业入股合同, 打通金融支农渠道, 丰富小额信贷产品设计, 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以自有资金入股区域特色产业, 同时制定明确方案, 切实保障多元主体的权益。最后, 推进并优化劳动力市场建设与服务。政府应积极推动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建设, 确保从日常土地经营中解放出来的农户能够找到与其人力资本相匹配的工作。此外, 相关部门还应定期发布工作信息, 积极治理农户工资拖欠等问题, 以保障农户权益。

3) 优化改革宏观环境, 建立有利于“三变”改革实施的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 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落地实施, 使“三变”改革实践有法可依; 同时, 应积极筹建乡村“人才库”, 通过多样化奖补措施激发各类人才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逐步探索建立支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三变”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机制; 完善财政、金融、税收等服务, 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三变”改革项目的实施; 最后, 强化政法系统对改革过程的支持, 保障“三变”改革主体的权益, 并做好风险防控。

参考文献:

- [1] 符刚, 陈文宽, 李思遥, 等. 推进我国农村资源产权市场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11): 14-23, 110.
FU G, CHEN W K, LI S Y, et al. The dilemma and path choice of promoting property right marketiz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in China[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37(11): 14-23, 110.
- [2] 何文剑, 赵秋雅, 张红霄. 林权改革的增收效应: 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3): 46-67.
HE W J, ZHAO Q Y, ZHANG H X.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of the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Mechanism discuss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3): 46-67.
- [3] 许庆, 尹荣梁, 章辉. 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1, 46(3): 59-71, 94.
XU Q, YIN R L, ZHANG H. Economies of scale, returns to scale and the problem of optimum-scale farm manage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46(3): 59-71, 94.
- [4]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4.
LIN Y F. System,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M]. 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 2014.
- [5] 周南, 许玉韞, 刘俊杰, 等. 农地确权、农地抵押与农户信贷可得性: 来自农村改革试验区准实验的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1): 51-68.
ZHOU N, XU Y Y, LIU J J, et al. Farmland titling, farmland mortgage and availability of farmers' credit: evidence from rural reform experimental area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11): 51-68.
- [6] 黄砾, 谭荣. 农地还权赋能改革与农民长效增收机制研究: 来

- 自四川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5): 12-21, 110.
- HUANG L, TAN R. Study on farmland right enabling reform and long-term increase in rural incomes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Sichuan Province urban and rura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area[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5, 36(5): 12-21, 110.
- [7] 郭晓鸣.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需求、困境与发展态势[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4): 4-8, 17.
- GUO X M. Reform in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demand, dilemma an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1(4): 4-8, 17.
- [8] 周力, 沈坤荣.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 来自“三权分置”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22, 57(5): 141-157.
- ZHOU L, SHEN K R. Impact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growth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2, 57(5): 141-157.
- [9] 郑淋议, 李焯阳, 钱文荣. 土地确权促进了中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吗? 基于 CRHPS 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23, 23(2): 447-463.
- ZHENG L Y, LI Y Y, QIAN W R. Does land certification increase China's farm siz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HPS[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3, 23(2): 447-463.
- [10] 夏英, 钟桂荔, 曲颂, 等.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做法、成效及推进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39(4): 36-42.
- XIA Y, ZHONG G L, QU S, et al. System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in pilot projects: approaches, effectiveness, and countermeasure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 39(4): 36-42.
- [11] 高鸣, 芦千文.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70 年发展历程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0): 19-39.
- GAO M, LU Q W. Sev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10): 19-39.
- [12] 张瑞涛.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逻辑及创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 126.
- ZHANG R T.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tudy on the logic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China [D].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1: 126.
- [13] 罗凌, 崔云霞. 再造与重构: 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12): 153-157.
- LUO L, CUI Y X. Reengineering and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Liupanshui, Guizhou[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6(12): 153-157.
- [14] 王东京, 王佳宁. “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核心要义与推广价值[J]. 改革, 2017(8): 5-15.
- WANG D J, WANG J N.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core essence and popularization value of the reform of “three changes” [J]. *Reform*, 2017(8): 5-15.
- [15] 陈全. “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制度创新[J]. 改革, 2017(11): 43-46.
- CHEN Q. Theoretic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ree changes” reform to promot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J]. *Reform*, 2017(11): 43-46.
- [16] 王永平, 周丕东.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探索: 基于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实践的调研[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39(1): 27-35.
- WANG Y P, ZHOU P D. An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n the rur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form practice of the rural “three changes” in Liupanshui City, Guizhou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 39(1): 27-35.
- [17] 陈林. 习近平农村市场化与农民组织化理论及其实践: 统筹推进农村“三变”和“三位一体”综合改革[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2): 1-11, 157.
- CHEN L. Xi Jinping's theory of rural marketization and peasants organization and its practic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reform of rural “three changes” and “trinity cooperation system”[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18(2): 1-11, 157.
- [18] 姜长云, 芦千文. 贵州六盘水乡村“三变”改革实践经验及后续完善建议[J]. 西部论坛, 2018, 28(3): 86-93.
- JIANG C Y, LU Q W. Three-change reform practice experience of Liupanshui rural areas of Guizhou and its post-perfection suggestions[J]. *West Forum*, 2018, 28(3): 86-93.
- [19] 黎智洪, 唐皓天.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增收效应: 基于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证研究[J]. 经济纵横, 2023(12): 64-75.
- LI Z H, TANG H T. Income increasing effect of China's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areas[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3(12): 64-75.
- [20] 刘琴, 周真刚. “三变”改革股权架构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调查[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37-42.
- LIU Q, ZHOU Z G.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path choice of “three changes” reform of shareholding structure: a survey in Liupanshui City, Guizhou[J].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8(3): 37-42.
- [21] 王永平, 黄海燕.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风险防控问题探析: 以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为例[J]. 经济纵横, 2019(9): 63-71.
- WANG Y P, HUANG H Y. Analysis 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taking the “three changes” rural reform in Liupanshui City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19(9): 63-71.
- [22] 张绪清. 农村“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基于六盘水的地方性实践[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89-99.
- ZHANG X Q.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ree changes” reform to promote th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local practice in Liupanshui City[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1): 89-99.
- [23] 张建, 孙兆霞. 农户土地经营权实现方式与减贫发展: G 省 P 市“三变”实践张力试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3): 91-102, 155.
- ZHANG J, SUN Z X.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alizing ways of peasantry's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analyzing the tension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P city, G province[J]. *Journal*

-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18(3): 91-102, 155.
- [24] 孔祥智, 穆娜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 以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为例[J]. 新疆农垦经济, 2016(6): 1-11.
- KONG X Z, MU N N.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taking Liupanshui City's "three changes" reform as an example[J]. 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 2016(6): 1-11.
- [25] 张应良, 徐亚东. 农村“三变”改革与集体经济增长: 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40(5): 8-18.
- ZHANG Y L, XU Y D.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 40(5): 8-18.
- [26] 闫照, 韩德军. “三变”改革促进农民增收了吗? 基于 DID 模型的实证检验[J].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3, 14(4): 22-32.
- YAN Z, HAN D J. Has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DID model[J]. Journal of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023, 14(4): 22-32.
- [27] 杨慧莲, 刘培生. 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践、影响及扩散研究综述[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3(4): 1-11.
- YANG H L, LIU P 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the connotation, practice, influence and diffusion[J]. Journal of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2021, 33(4): 1-11.
- [28] 张红宇, 胡振通, 胡凌啸. 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向深入[J]. 农村工作通讯, 2020(9): 19-26.
- ZHANG H Y, HU Z T, HU L X. The second leap of rural reform: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J]. Rural Work Newsletter, 2020(9): 19-26.
- [29] 潘丹, 周金龙, 周应恒.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变迁与趋势: 基于 2010—2020 年 76 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2, 27(6): 278-289.
- PAN D, ZHOU J L, ZHOU Y H. Evolution and trend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76 policy texts from 2010 to 2020[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2, 27(6): 278-289.
- [30] 张浩, 冯淑怡, 曲福田. “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2): 81-94, 106, 7.
- ZHANG H, FENG S Y, QU F T.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ase evide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2): 81-94, 106, 7.
- [31] KARCH A. 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state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J].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2007, 7(1): 54-80.
- [32] 王家庭.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07(7):39-44.
- WANG J T. Spatial diffusion mechanism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national comprehensive reform experimental area[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7(7):39-44.
- [33] 王浦劬, 赖先进. 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0(6): 14-23.
- WANG P Q, LAI X J.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50(6): 14-23.
- [34] 姚志, 高鸣. 中国农村承包地确权: 政策演进、关键问题与产权优化[J]. 中国软科学, 2022(6): 72-84.
- YAO Z, GAO M. Rights confirmation of rural contracted land in China: policy evolution, key problem and property optimization[J]. China Soft Science, 2022(6): 72-84.
- [35] 罗必良. 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 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40(1): 17-31.
- LUO B L. The property rights: From delimitation to implementation: The logical clue of Chinese farmland management system transformation[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 40(1): 17-31.
- [36] 杨慧莲. 农村“三变”改革及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六盘水市的观察与证据[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4.
- YANG H L. Research on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and its influence on farmers' incom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evidence of Liupanshui City[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24.
- [37] 冯道杰, 程恩富. 从“塘约经验”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实施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8, 38(1): 22-32.
- FENG D J, CHENG E F. The endogenous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experience of Tangyue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8, 38(1): 22-32.
- [38] 刘守英. 新一轮农村改革样本: 黔省三地例证[J]. 改革, 2017(8): 16-25.
- LIU S Y. The sample of rural reform in a new round: taking three places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Reform, 2017(8): 16-25.
- [39] CONNING J H, ROBINSON J A.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2(2): 416-447.
- [40] 杨慧莲. “三变”改革促进乡村发展的实践、问题与建议[J]. 科技中国, 2023(3): 25-29.
- YANG H L. Practic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J]. Scitech in China, 2023(3): 25-29.
- [41] LAKSHMANAN T R. A systems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J]. World Development, 1982, 10(10): 885-898.
- [42] 邓大才. 中国农村产权变迁与经验: 来自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 4-24, 204.
- DENG D C. Exper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China: a na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ffering food for thought[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7(1): 4-24, 204.
- [43] ABADIE A, DIAMOND A, HAINMUELLER J.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0, 105(490): 493-505.
- [44] 刘友金, 曾小明. 房产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来自重庆和上海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1): 98-116.
- LIU Y J, ZENG X M.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 Transfer from the Property Taxes: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Chongqing and Shanghai[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11): 98-116.
- [45]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JIANG T.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causal inference[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2(5): 100-120.
- [46] 苏毅清, 游玉婷, 王志刚.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 2016(8): 17-28.
- SU Y Q, YOU Y T, WANG Z G.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situation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J]. *China Soft Science*, 2016(8): 17-28.
- [47] 程名望, 盖庆恩, Jin Yanhong, 等.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 2016, 51(1): 168-181, 192.
- CHENG M W, GAI Q E, JIN Y H, et al. Focusing on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and income growth[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6, 51(1): 168-181, 192.
- [48] 张龙耀, 杨军, 张海宁. 金融发展、家庭创业与城乡居民收入: 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7): 47-57, 84.
- ZHANG L Y, YANG J, ZHANG H N. Financial development,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icro-perspectiv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3(7): 47-57, 84.
- [49] 李涛, 张鹏.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增长[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12): 43-54.
- LI T, ZHANG P. Farmland property right, factor allocation and peasant household income growth[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0(12): 43-54.
- [50] ABADIE A, DIAMOND A, HAINMUELLER J.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 59(2): 495-510.
- [51] 米旭明, 王文思.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11): 62-83.
- MI X M, WANG W 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ransfer[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1, 38(11): 62-83.

(责任编辑: 孟岑)